

# 从“堕距”到“弥合”：易地搬迁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张力与调适

——基于文化堕距理论视角

贺芒, 范飞, 赖翰文

(重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400044)

**摘要:** 易地搬迁实质上是一场从村庄到社区、从传统到现代、从农民到居民过渡的村庄转型实践, 也是传统村落天然共同体向现代社区共同体转变的过程, 在整个情景切换中, 环境变迁是导致村庄地域性空间的天然共同体遭到现代化冲击的根源。本文以奥格本的“文化堕距理论”为基础, 对L易地搬迁社区治理实践过程进行了细致剖析。研究发现: 易地搬迁社区由于受到由乡土到社区的环境骤变影响, 适应文化变迁速率滞后于物质文化变迁速率, 产生制度、组织以及文化的堕距, 导致传统村落天然共同体向现代社区共同体的转换存在诸多需要化解的结构性实践张力。可从制度、组织、文化等三个层面进行堕距弥合, 即通过以塑造治理规则推动共同体秩序共建、以优化治理结构驱动共同体资源共治、以文化沉浸凝聚共同体价值共识的多维路径, 将已消解的乡土共同体在新社区进行重塑, 从而构建一种治理有效的新共同体模式。

**关键词:** 多重堕距; 易地搬迁社区; 城乡切换; 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D630; D66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5)05-0065-10

## From lag to bridging: Tensions and adaptations of building governance communities in relocation communities —A perspective based on cultural lag theory

HE Mang, FAN Fei, LAI Hanwen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Relocation is, in essence, a transformative practice that shifts villages into urban communities, transitions traditions into modernity, and turns farmers into urban residents. It represents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rural communities into modern communal structures, wherein environmental changes serve as the root cause of the disruption to the natural communal bonds inherent in rural spatial settings under the forces of modernization. Based on Ogburn's "Cultural Lag Theory", this paper conduct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governance practices in Community L relocation initiativ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due to the abrupt environmental shift from rural to urban settings, the adaptive capacity of relocated communities lags behind the rapid changes in material conditions, resulting in lags in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These disparities create structural tensions that hinde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village communities to modern communal structures. The cultural lag can be bridged through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namely: shaping governance rules to co-construct communal order, optimizing governance structures to enable collective resource governance, and fostering cultural immersion to consolidate shared value consensus, so as to reconstruct the dissolved rural community within the new urban settlement, and ultimately establish an effectively governed neo-community model.

收稿日期: 2025-05-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BSH132)

作者简介: 贺芒(1970—), 女, 四川巴中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Keywords:** multiple lags; relocation communities; rural-urban transition; community

## 一、问题提出

易地搬迁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打赢脱贫攻坚战采取的重要举措。其从根本上解决了“一方水土不能养一方人”的极度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改善了近千万移民的生产、生活环境与条件,基本实现了生计模式的非农化转变。这一实践彰显了我国在贫困治理领域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智慧价值<sup>[1]</sup>。易地搬迁并非简单的人口空间迁移,而是一场史无前例、规模浩大且错综复杂的社会工程——它深刻变革了传统的乡土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本质上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转型的缩影。我国城乡转型的特殊性在于其需同时应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叠加推进,而“四化”进程的不同步,进一步引发了复合型堕距。在这一变革转型中,易地搬迁社区集中凸显了农村传统性与社区现代性之间的实践张力,即以小农经济、地方性知识及血缘地缘熟人社会为内核的传统乡村逻辑,正被集中安置型社区以城市化公共生活、组织行为、多元生计模式及制度约束<sup>[2]</sup>为特征的现代城市逻辑逐步替代。然而,易地搬迁社区因建成时间较短,移民群体原本赖以生存的生活空间、生计方式、社会关系及治理规则等核心领域发生系统性骤变。这种骤变使得乡村原有的生产体系、社会秩序及社会网络<sup>[3]</sup>难以适配现代化社区建设要求,进而导致社区治理的应然效能与实然效能之间产生显著差距,形成“堕距”现象。具体表现为社区社会关系疏离、集体认同缺失、个体高度原子化以及治理结构紊乱,给社区有效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sup>[4]</sup>。易地搬迁社区作为一种具有政策属性的特殊社区类型,兼具“半城半乡”属性,其治理走向应以实现自身治理有效为价值基准,超越城乡社区非此即彼的二元模式,逐步探索形成“自成一格”的特色治理模式<sup>[5]</sup>。因此,面对易地搬迁社区的治理困境,追溯其实际形成根源、探索提升治理效能的可行路径,既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环节,也是推进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对推动易地搬迁社区高质量发展,如期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易地搬迁作为国家主导的规划性社会变迁,对搬迁居民而言,不仅是生存空间的转换,更是生产生活、文化、制度等领域的跃迁与变革,深刻影响社区治理与社区共同体的构建。学界主要从三个层面对易地搬迁社区治理展开研究:一是文化层面。易地搬迁并非单纯的空间转移与人口迁移,而是一场剧烈的社会文化变迁。在此过程中,搬迁居民在习惯、道德、风俗及观念层面的适应往往滞后于环境变化,容易产生“文化堕距”现象<sup>[6]</sup>。伴随这一变迁,乡土社会原有的社会网络、交往模式、文化传承机制及集体认同感逐渐消解与断裂,既冲击了传统乡村社群组织与人际关系互助网络<sup>[7]</sup>,也使搬迁居民面临重新调整、延续与建构新生活秩序的系统性挑战<sup>[8]</sup>,部分居民因难以适应这种剧烈的社会文化变迁而陷入社会融入困境。对此,可通过重塑文化生活空间、重建移民社会关系网络、引导民族融合<sup>[9]</sup>、加大教育投入、引入健康城市文化等文化治理路径,推动搬迁居民在新环境中调整生产生活与社会交往方式<sup>[10]</sup>,以适应生存空间变迁。二是组织层面。在易地搬迁导致传统生计网络断裂与社会资本亟待重构的双重压力下,行政指令主导的治理模式与自治能力阙如的治理情境产生错配,暴露出治理主体能力滞后的核心问题<sup>[11]</sup>。在此背景下,重组社区结构并激发内生性团结力量,成为实现移民可持续生计发展、促进社会融合与社区和谐稳定的关键<sup>[12]</sup>。这一目标的达成,核心在于通过居民组织化驱动集体行动。因此,可通过“组织嵌入”与“组织再造”两种路径,整合外部治理主体资源并培育社区内部治理动力,推动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进而重建社区公共性并形成共同体<sup>[13]</sup>。三是制度层面。针对易地搬迁社区秩序系统性紊乱问题,可借助制度安排的力量重建社区新秩序:依据“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分权管理体制,构建包含高效的财政支持体系、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政策<sup>[14]</sup>等在内的正式制度规范,同时辅以居民公约、道德银行积分等非正式制度约束,形成双重制度合力以形塑社区秩序。然而,在政策执行中存在瞄准失焦、执行偏差、衔接缺乏、力度不足等问题,导致社区内部非正式制度与外部正式制度之间出现结构失衡<sup>[15]</sup>,直接影响新社区治理秩序

的稳定。因此,政府需通过制定针对性规则,规范多元治理主体、治理事务及空间场域之间的互动过程,推动制度服务与自治事务的深度融合<sup>[16]</sup>,从而实现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的制度化。

既有研究虽深化了对易地搬迁社区治理议题的认识,但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首先,既有研究过度强调易地扶贫搬迁与文化、空间、制度三者在社区治理中的对抗性互动过程,忽视了三者在地方实践中融合的可能性,亦未深入追溯这种对抗性的根源。其次,既有研究对易地搬迁社区“半城半乡”的属性关注不够,忽视了社区发展中衍生的社区原子化现象、共同体意识淡薄、组织化程度低及治理结构不完善等影响因素。最后,既有研究忽视了环境变迁对文化、组织和制度的塑造作用。

基于此,本研究立足“堕距理论”,聚焦L易地搬迁安置型社区治理实践过程,通过剖析该社区从前期“堕距”到后期“弥合”的故事细节,阐释宏观环境变迁下微观社区治理有效的行动逻辑,以期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相关思路。

##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构建

### (一)“文化堕距”理论及其适用

堕距理论最早源于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Ogburn)提出的“文化滞后”,后常被称为“文化堕距”。奥格本指出,社会变迁的根源并非达尔文所指的生物进化因素,而在于文化自身的变迁。他认为,若文化的两个组成部分中,某一部分变迁得更快或更显著,导致两部分无法维系原有协调关系并出现失调,则会产生“文化滞后”<sup>[17]</sup>,即“文化堕距”。“文化堕距”的理论内涵远比概念本身更复杂,其核心可概括为以下四点:(1)至少有两个变量,(2)这二者是协调的,(3)在某个时间,一个已经变迁而其他没有变迁,或者一个比其他变化得快,(4)当一个变量比其他变量变迁得更快时,它们不如以前那样协调。奥格本将文化划分为适应文化与物质文化两类:适应文化涵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具体包括知识、制度、信仰、道德、社会习惯、法律和风俗等意识形态;物质文化指人类创造的有形实体和人工制品,例如建筑、交通工具、日常用品等具体物质对象。实践中,适应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变迁频率往往是不同步的,当物

质文化的变迁速度比适应文化快时,二者易产生冲突与失调,形成堕距。奥格本的“文化堕距”理论因其对社会变迁中失调现象的深刻洞察,已被广泛应用于分析不同领域的适应性滞后问题。研究者们据此进一步衍生出“执法堕距”<sup>[18]</sup>、“制度堕距”<sup>[19]</sup>、“技术堕距”<sup>[20]</sup>、“治理滞距”<sup>[21]</sup>等关联概念。尽管这些研究的主题各异,但其核心均围绕“堕距”展开,共同揭示在环境变迁的压力下,系统各部分(如理念、规则、结构、行为)的适应速率差异是造成理想与现实差距的关键根源。借鉴上述理论视角,本文将剖析易地搬迁社区这一剧烈转型场域,聚焦因物质环境骤变与适应文化调适滞后所产生的“多重堕距”现象,并探究其背后的治理张力。

“文化堕距”理论揭示了社会变迁的内在归因与环境变迁速率的因果关系,这一核心逻辑与研究特定时空条件下、环境骤变情境下所产生的易地搬迁社区治理问题,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具体理由如下:一是实践情境的契合。易地搬迁是由传统乡村到现代社区、村民到居民、适应到物质的环境变迁过程;而“文化堕距”理论认为社会变迁源于文化各组成部分的非同步性变迁。可见,“环境变迁”均是驱动二者整体过程变化的核心动力,这为理论与实践的对接提供了基础情境。二是生成逻辑的契合。在移民由传统乡村搬迁到现代社区的过程中,房屋、技术、道路等物质对象构成的物质环境的变迁速度,比观念、信仰、风俗及制度等适应文化变迁快,这种显著速率差,使得移民个体的认知惯性与行为模式滞后于新的物质环境与社会规则,导致社区层面的冲突与结构性不协调。而“文化堕距”理论的核心机制,是“适应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变迁错位,引发社会结构的系统性失调”。这一逻辑与易地搬迁的实践过程高度吻合。三是总体表征的契合。“文化堕距”理论明确其发生需满足“至少两个变量,且变量间因变迁速率差异产生失调”的条件,这一表征在易地搬迁场景中同样存在。易地搬迁在城—乡环境切换过程中,宏观层面适应文化与物质文化变迁速率不一致的文化堕距,并非直接导致微观层面的社区治理效能下降,而是通过中观层面制度、组织、文化等多重变量的中介传导作用,来影响微观治理效能,这与“文化堕距”理论对“多

变量作用”的强调形成呼应。综上所述,“文化堕距”理论为分析特定时空条件下、环境骤变下的易地搬迁社区治理问题,提供了较强的理论适配性。

## (二) “制度-组织-文化”的三维分析框架

易地搬迁社区是传统村落向现代社区转型的产物,其实质是天然共同体向现代共同体的深刻转变。在此转型中,受到乡土到社区的环境骤变影响,社区适应文化变迁的速率滞后于物质文化变迁速率,导致易地搬迁社区现代化的实然治理体系与搬迁移民行为习惯、治理能力及治理事务需求之间出现适配错位,进而造成应然治理状态与实然治理状态间的差距,出现“社区堕距”,并引发系列社区治理困境。具体表现为:治理制度供给与社区实践需求不匹配,引发制度性失衡与主体间关系失调,削弱社区秩序规制能力<sup>[22]</sup>;社区组织化程度的高要求与居民主体性能力不足之间的张力,导致居民参与不足、资源整合低效、治理回应迟滞等困境,制约社区发展活力<sup>[23]</sup>;易地搬迁社区在规范文化、实体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层面的失序与断裂,促使居民呈现出社会性回避与功能性依恋的双重特质<sup>[6]</sup>,侵蚀社区集体认同基础。可见,社区治理的有效性依赖于制度、组织以及文化三者之间的适

度整合与良性互动。具体而言,制度为组织提供了行动准则,通过协调和约束组织间的沟通、合作、竞争、冲突、同化等互动过程,规范组织选择合适的行动策略,以此降低社区实现有效治理目标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组织作为社区多元主体策略选择与互动的核心载体与场域,通过组织化过程聚合社区治理所需的人、物、财等各类资源,并整合和调适社会体系中的经济保障、社会排斥、社会团结和社会赋权等<sup>[24]</sup>关键要素,促进政府、社会、居民等多元主体间的良性互动;文化是由某种知识、规范、道德、价值观等所构成的人们精神或观念,它并非一种个人知识和感悟,而是社会成员一种共同体意识和默契<sup>[25]</sup>,为社区有效治理奠定了公共性的价值基础。总体而言,制度规范了组织行为,而组织的互动不断推动制度创新与重塑,文化则为二者互动提供理念基础,并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试图在“文化堕距”理论的基础上,搭建“制度-组织-文化”的三维分析框架(图1),从环境变迁的视角理解易地搬迁社区“堕距”现象引起“治理堕距”的结构性困境,探讨如何弥合堕距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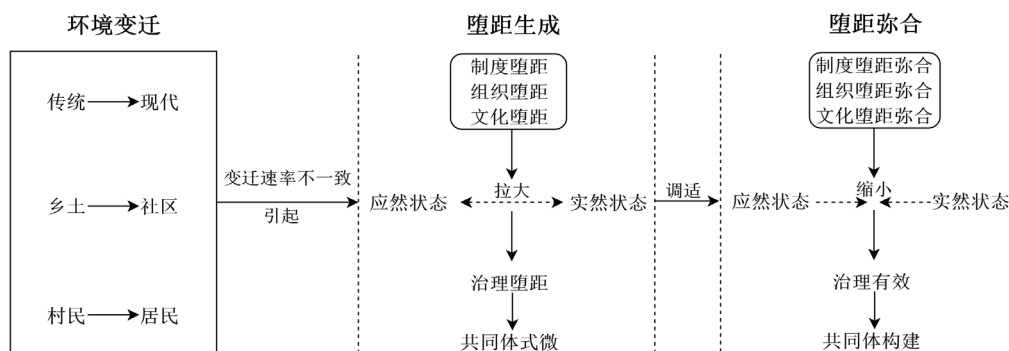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制度-组织-文化”的“堕距”生成与弥合的分析框架

制度堕距是指制度目标(理想状态)、制度设计(文本状态)和制度实践(执行状态)三者间存在的系统性偏差,以及由此引发的规则冲突与功能失调现象;组织堕距是指社区现代化衍生出的社会环境与社区组织化、主体组织能力之间的差距;文化堕距是指社区现代化进程所要求的治理理念、行为规范与居民群体基于传统乡土情境形成的观念认知、价值取向之间的速率差与认知差距。三者叠加形成的复合堕距效应,持续拉大社区治理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之间的差距,导致治理堕距,进而结

构性消解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动力。

奥格本的“文化堕距”理论明确,“堕距”的调适与弥合核心在于优化适应文化,通过改革或技术创新推动适应文化变革,缩小其与物质文化的变迁差距,最终实现二者再协调。这一逻辑可在“美国工伤事故法与机器工厂的变迁互动过程”中<sup>[17]</sup>得到印证,早期美国农场中,机器操作简单,基于农业生产场景形成的事故习惯法,能够有效解决工伤纠纷;但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工厂中高速运转的复杂机器频繁引发工人死亡或伤残,此时仍沿用

适配简单农具时代的习惯法处理复杂的工业工伤问题，会使工伤赔偿标准（适应文化的一部分）与新型工业风险（物质文化显著变迁）严重失调——伤残者获得的抚恤金远不足以弥补其身心损失与经济损失。直至新工伤事故法颁布，改革后的法律体系才真正适配工业机器环境的需求，既保障了工人合法权益，又实现了适应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再平衡。这一案例清晰表明，通过改革创新适应文化以适配物质文化变迁，是弥合二者堕距、实现系统协调的有效路径。基于上述理论与案例启示，由环境骤变引发的易地搬迁社区治理堕距，同样可通过制度改革、组织优化与文化沉浸等适应文化创新予以弥合，主动适配物质文化的变迁需求。具体而言，制度为组织提供行动边界；组织为文化凝聚与价值实践提供行动场域；文化则为制度与组织的互动注入价值共识。三者通过互为支撑、协同互构的动态过程，逐步弥合易地搬迁社区治理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间的差距，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构建。

### 三、案例选择与研究方法

#### （一）案例介绍

L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下文简称“L社区”）是重庆市Q区18个深度贫困乡镇集中安置点项目之一，亦是“十三五”时期重庆市规模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该社区不仅入选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典型案例，还获评“美丽搬迁安置区”，具备较强的实践示范价值。L社区于2019年正式投入使用，入驻居民来自全区29个乡镇街道，5个居民小组，现有住户413户、总人口1498人。与“整组搬迁”模式不同，该社区以“散户组合”为主，迁入群体均来自基本生存发展条件匮乏、脱贫难度大的区域，彼此间缺乏前期社群联结基础。这种特殊的搬迁模式，使得移民群体短期内难以完成从“村民”到“居民”的身份转换，普遍存在文化素养较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生活习惯显著差异、政策理解能力参差不齐及法治意识淡薄等问题，给社区后续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为此，L社区成立了居民委员会，通过强化党建引领作用、优化社区治理制度结构、设置居民联络群、组织开展文化活动以及组建志愿服务队等方式，推动由党和政府、社会力量及搬迁居民组成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的

构建，实现社区由乱到治、由治到稳的良好局面。

####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资料收集

本文选择L社区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一是案例的典型性。L社区移民从高山村寨搬迁到现代安置社区，居民的文化、观念、价值等适应文化变迁过程远滞后于社区居住设施等物质文化的变迁过程，二者产生错位，契合奥格本所说的典型堕距现象。二是案例的代表性。L社区是重庆市规模最大的易地搬迁社区，搬迁居民群体复杂，反映了重庆市易地搬迁社区的共有特征。三是案例的完整性。L社区经历了前期的秩序紊乱到后期的秩序稳定两个阶段，符合研究“堕距”生成到“堕距”弥合的完整过程，对探讨社区前后差异背后的治理逻辑具有一定研究价值。

2023年6月5—15日，笔者随团队前往重庆市Q区L社区，通过集体座谈、实地考察、入户访谈、问卷调查以及线上回访等方式开展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对该社区的治理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共访谈区乡村振兴局、区发改委、区委政法委、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委等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及工作人员、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驻村工作队、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社会组织、企业、社区积极分子、居民等39人，获得丰富的研究材料。材料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访谈材料。搜集与整理社区相关治理主体的访谈材料，获得访谈录音约100小时，经录音转文字稿约20万字。二是二手官方资料。收集整理政府及社区层面的宣传与交流材料、内部政策文件、工作台账和工作汇报等文件共29份。三是其他材料。收集围绕该社区相关的期刊数据库、报纸、网络媒体报道等信息。遵循“三角验证”原则分析以上材料，提升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 四、堕距生成：村落地域性消解与社区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张力

在易地搬迁社区治理中，环境骤变引发的物质环境与适应文化变迁速率差，导致适应文化中的制度、组织、文化三个核心维度在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传统与现代、村庄与社区之间产生结构性矛盾，形成“实践张力”。易地搬迁是将土地、习俗、血缘等联结的传统村落共同体成员，经整体或分散搬迁聚集于新空间，瓦解乡村社会土壤并消解“天然

共同体”，其本质并非简单的“去乡土性”的城乡切换，而是移民从村庄到社区、从传统到现代、从农民到居民的市民化转型过程。在整个环境变迁过程中，传统天然村落共同体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遭到现代化的冲击，造成现代物质环境与传统适应文化的不适配，产生堕距。具体到L社区，移民在从村庄迁移到社区、从农民到居民的市民化转变中，社区生活环境的剧烈骤变与传统适应文化的断裂，引发了社区制度、组织以及文化等多维嬗变堕距，冲击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格局与秩序。

### （一）制度堕距：理性规划与执行偏差的张力

制度是社区秩序生产与延续的基石，制度安排合理关系着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秩序的稳定。然而，制度变迁又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制度的变与不变取决于制度本身与外部环境之间持续不断地互动与调适<sup>[26]</sup>。当制度变迁滞后于所处环境时，其理想目标、文本状态与真实执行之间便会产生差距，形成制度堕距。L社区在经历乡土向城市的转变初期，相关制度未能随社区环境转变而及时调整，导致易地搬迁社区制度出现文本状态滞后于理想状态的“上向堕距”与执行状态滞后于文本状态的“下向堕距”的两种现象，从而造成制度规划供给与实践执行难以同频共振。具体表现如下：一是上向堕距。一方面，制度完备性不足，需求回应存在偏差。社区移民刚从熟悉的农村搬到陌生的社区，面临经济区隔、社会区隔、生活区隔等多重困境。从制度理想目标的应然逻辑看，制度需全面回应移民在生计保障、社会融入、身份认同、政治参与以及文化适应等方面的系统性需求，以推动人的全面融入。但从实际的制度制定层面看，正式出台的制度文本更多优先聚焦产业、就业、创业等经济内容，对培育社区归属感、激活居民主体参与、重构地方性文化等社区认同需求的供给明显不足，形成制度文本与理想目标的典型偏差。例如，迁入地政府前期未及时出台制度明确搬迁居民户籍归属，导致移民“人在L社区、户籍在迁出地”的“人籍分离”现象，不仅引发了“归口管理与属地管理”的权责冲突，更弱化移民的社区认同。“随便走到哪家去，你问他们是哪里的，他们会说自己是迁出地那边的，不会说是L社区的，刚来的时候对在地的居委会也很排斥，他们认为管他们的应该是户籍所在地的居委

会”（230607Y社工机构负责人）。另一方面，制度模糊性挤压社区自主性空间。L社区前期因缺乏对社区法定职责边界的制度性厘清，上级政府职能部门以“职责模糊化”为策略，将部门条线任务以行政指令形式超载下沉，挤压了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主空间，导致社区承担过重事务压力。“过去政府搞了很多事情，但是法治化不完善，发展环境不成熟，在社区完全搬法条也是无解的，在基层治理方面，确实我们的压力是很大”（230607街道办事处Z书记）。二是下向堕距。易地搬迁社区的政策文件多由国家层面制定颁布，侧重于宏观性、原则性的指导，而L社区在前期未能构建与之配套的中微观操作性制度体系，表现为既未完成将宏观政策原则性要求细化为具体流程的“制度转化”，又未完成结合社区特征对政策细节进行“本地化适配”，最终导致宏观政策在地方层面出现“执行真空”，制度文本难以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在非正式制度层面，L社区虽形式上制定了居规民约，但其实质内容遵循行政任务导向下的统一化标准，而非源于居民自组织协商共识，因此，该非正式制度认可度不高、规制力不强，制度文本与执行实效间存在较大差距。“居规民约对部分人有约束，但对于多数人还是没有的。像老年人几乎不认识字，你跟他们说居规民约，他们就认为你在忽悠。”（230608公益性岗位W居民）

### （二）组织堕距：团体合作与离散结构的张力

组织是社区共同体生存与稳定的动力，在易地搬迁城乡的空间切换中，传统村社共同体随搬迁发生解体，搬迁居民随之陷入“去组织化”状态。于L社区而言，搬迁群众源自不同偏远贫困村庄，原本依附于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居民因搬迁失去原有组织联结，总体性的乡村社会结构也随搬迁被打破，使得“基于血缘地缘的组织网络”与“依托熟人关系的动员机制”等组织化发展所需的基础土壤被侵蚀。这种“传统组织基础消解与新组织体系未建”的困境，导致新社区的“自我组织能力”与现代社区治理所需的“高组织化程度”之间形成显著差距，最终产生“组织堕距”。主要表现如下：一是主体能力较弱。L社区居民构成兼具“复杂性”与“弱势性”特征，居民群体中弱势群体占比高，能力短板明显，居民的能力基础难以适配现代社区

治理体系的组织参与要求,无法有效承接社区组织提供的资源与机会。“2022年,我们驻村工作队员再次通过面访、电话联系等方式完成413户搬迁群众遍访,发现社区现有残疾63人、享受低保90户233人、慢性病人员82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22人、无劳动力779人,老幼妇孺占比超60%,社区治理形势不容乐观。”(230607驻村Z书记)二是乡土组织化地方性缺失。L社区搬迁过程不仅瓦解了原有的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还弱化了乡土权威、互助传统等地方性内生资源。这一变化使得搬迁社区既难以借助熟人社会机制有效地联系群众,又无法通过居民组织化建立动态、全覆盖的组织网络,因而难以有效回应社区居民的日常需求和利益诉求。三是自组织建设滞后。2019年L社区投入运行之初,政府的工作重心过度聚焦于居委会、党组织等法定社区组织,对自组织的培育缺乏政策支持与资源投入,导致社区老年协会、志愿服务组织等自组织建设发展相对滞后。自组织的缺位进而引发自治空转、居民参与不足及政治失语等一系列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组织堕距的影响。

### (三)文化堕距:现代理念与传统意识的张力

在现代化社区治理理念的冲击下,传统的乡土文化意识难以快速适配时代发展的需求,无法正常发挥文化在“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等方面的调节功能<sup>[27]</sup>,进而导致社区治理的调适滞后,最终为“文化堕距”的产生创造条件。实践中,L社区移民从单一文化的乡村环境骤然过渡到多元异质文化的社区环境,剧烈的社会环境变迁使其难以实现即时的缓冲与调适,导致传统乡土文化滞后于社区的现代化建设要求。这种知识、道德、观念等乡土适应文化,与房屋、道路、基础设施等现代社区物质文化间的差距,形成了典型的“文化堕距”。主要表现如下:一是观念滞后与盲目依从。L社区部分居民“扶贫依赖观念”尚未转变,对政策权利的边界理解存在偏差,期待政府延续搬迁前的“全保姆式”服务模式,“等、靠、要”思想仍存在。更甚者,个别居民刻意曲解政策内涵、误导其他群众,煽动群众非理性聚集或集访信访,扰乱社区正常治理秩序。“有少部分人有劳动能力,他不愿意去工作,这就是‘等、靠、要’思想的一种,这一部分人你只有通过慢慢引导去激发他的内生

动力。”(230607Z主任)二是传统乡土生活模式与现代社区理念的冲突。社区许多搬迁移民仍固守农村固有的生活模式,与现代社区的制度化治理要求产生冲突,形成治理层面的结构性张力,增加了社区常规化管理的难度与成本。例如,社区居民随处乱丢垃圾、横穿马路、破坏公共设施等现象时常发生。“有的居民因为懒得下楼,看下面没人,就从五六楼直接扔垃圾下来,有安全隐患。还有的老年人把以前农村老家的瓶瓶罐罐带到搬迁住房里,但因为住房面积也有限,他们就放在楼道里,产生消防安全隐患。”(230607社工机构Y负责人)三是社会网络松弛与集体认同感缺失。社区社会环境的快速变迁瓦解了基于血缘、地缘的村落共同体意识,导致熟人社会网络松散化与社区集体认同弱化。对L社区而言,一方面,邻里间缺乏前期社群联结基础,短期内难以重建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另一方面,乡村原有的互惠机制与声誉机制因空间迁移无法有效移植到新社区。这双重困境使得居民间协同、合作、互助、照应的集体行动基础逐渐消解,多数人对社区事务持“旁观者”的心态,最终引发社区参与不足与集体认同感的双重缺失。“居民来自29个不同的乡镇,有不同的习俗,单独成立一个社区,居民非常排斥这个社区。”(230609Z社区副书记)

## 五、堕距弥合:易迁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调适进路

易地搬迁社区实质上是一场村庄向现代社区的转型实践,旨在推动传统村落天然共同体向现代社区共同体转变。然而,在乡土向社区的环境骤变影响下,社区适应文化的变迁速率显著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变迁速率,这种速率失衡引发了制度、组织以及文化层面的系统性堕距,并由此产生社会秩序缺失、治理结构散化、传统道德规范缺乏及社会关系松散等社会效应,阻碍了现代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因此,需从制度、组织与文化三层面系统弥合“堕距”,以制度规范组织行为、以组织互动推动制度创新、以文化沉浸为二者互动提供理念支撑,最终在新社区构建超越传统乡村形态的现代“互动治理共同体”。具体而言,L社区通过制度、组织、文化堕距弥合探索治理效应,为社区治理共

同体构建提供了新路径。

### (一) 制度堕距弥合：以塑造治理规则推动共同体秩序共建

制度是维系社区共同体主体结构、规范行动逻辑以及保障秩序稳定的基础。当制度本身存在模糊性、不完备性及缺陷时，社区治理主体在运用规则塑造社会环境的过程中易产生行为恣意性，进而导致制度目标意图与地方实践情景存在执行偏差，从而引发制度意外<sup>[28]</sup>。因此，为实现社区制度目标、制度文本与地方情境的适配，需立足当地现实治理需求，通过完善制度文本与调整制度执行过程，弥合制度缺失的“上向堕距”与制度执行偏差的“下向堕距”，从而塑造契合当地现实情境的制度形态。具体如下：

一是健全社区民主自治制度。一方面，制定社区自治规章制度并与现有《居规民约》有效衔接，拓展细化“居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赌禁毒会”等自组织的运行规则，搭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主体框架。同时，充分保障社区监事会、理事会、居民代表大会、党员大会的职能发挥，拓宽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渠道，严格落实重大事项“一事一议”机制，推动党务、村务、财务的规范化公开，实现服务群众透明高效，确保居民参与渠道便捷畅通，最终落实民主化的“四自”自治管理模式。另一方面，构建长效化的后续扶持工作机制，建立“迁出地+迁入地”共同帮扶“社区居民”的“2+1”铁三角联动模式，保障居民全生命周期内与户籍紧密关联的就学、就业、婚育、养老、医疗、丧葬等关键事务的处理，有效化解因归口管理与属地管理差异产生的职责冲突及衔接障碍。

二是推动政策的适应性执行。为破解“政策悬于纸面、难以落地”的困境，L区创新采取“正式+非正式”双轨并行的方式，打通政策宣传与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一方面，强化阵地化宣传，充分利用社区宣传栏、显示屏、墙体等载体，高频次、全覆盖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及乡村振兴政策，全景式呈现政策体系内容与实施动态，切实提升居民的政策知晓率。另一方面，以非正式互动形式深化政策宣讲，依托院坝会、群众会等基层平台，组织“榜样面对面”“小板凳”等特色宣讲活动，深度挖掘并整合区内案例典型，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鲜

活形式诠释政策内涵，清晰解读政策执行路径，引导群众理解、主动把握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

### (二) 组织堕距弥合：以优化治理结构驱动共同体资源共治

组织是社区资源整合、集聚、协调与运用的核心载体，可为社区多元治理主体提供表达利益诉求、沟通交流、社会支持、公共服务以及追求公平的平台。组织堕距的弥合，是国家政权嵌入与社区自组织化相互调适、协同统合的过程，其核心功能在于整合原子化个体行动与松散组织形态，系统性重构社区治理结构以适配新社会环境，为驱动共同体资源协商共治奠定良好的组织基础。具体做法如下：一是以党建嵌入建强组织核心。L社区集中搬迁入住之初，社区党总支入户走访摸排，发现搬迁党员27名，组织其成立党支部，并在区委组织部、区乡村振兴局支持下，配齐驻村工作队，强化了社区党建力量；此后，社区进一步推行网格化管理模式，构建“党员+网格员+法律顾问+乡贤”四位一体的服务管理体系，同时组织老党员、居民小组组长、退休老干部、群众等群体组建志愿服务队，促进邻里间的互助协作。二是建立“专班+网格”协同联动的资源整合与落实机制。一方面，组建专项工作专班负责资源协商统筹，由街道办事处牵头组建工作专班，专班通过定期召开协调会议，承担专项任务的资源协调、共识凝聚及实施方案制定等职能，为任务落实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另一方面，建立网格化运行机制以保障专项任务落实的资源配置，通过网格化管理实现政策、人力、资金等资源精准下沉至社区每家每户，确保资源效用最大化。三是支部引领自组织建设，整合居民人力资源。L区党支部发挥核心引领作用，整合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资源，积极培育社区自组织，并依托这些组织打造特色文化品牌。与此同时，社区积极主动引入外部优质资源，成功吸引青年志愿者协会、大学生志愿者协会、西部计划志愿者等6家组织入驻小区“青少年之家”并提供服务，有效凝聚了社区向心力，显著提升了居民的自我组织能力与自我服务能力。

### (三) 文化堕距弥合：以文化沉浸凝聚共同体价值共识

文化是人们共同具有的知识、信仰、观念和准

则的总和，它借助“权力的文化网络”所生成的象征性符号<sup>[29]</sup>，指导和调节着人们的社会互动过程，促使人们遵循隐性或显性的象征体系与行为规范，进而将个体维系为有机整体。因此，应对移民从村庄向社区流动引发的文化堕距，关键在于激活并转化移民潜在的乡村价值、信仰、知识、礼俗等乡村文化资本，推动其与新时代社区治理理念有机融合，培育社区成员共享的价值共识与情感归属，最终塑造具有高度认同感的社区共同体。具体做法如下：一是以评比表彰促思想转变。L社区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制度化、常态化开展先进典型评选与宣传活动，破除部分居民“等、靠、要”思想。一方面，及时制定印发先进典型评选方案，固化“每月评比”机制，明确评选标准、流程与激励措施，确保活动规范有序开展；另一方面，开展常态化、多层次的典型评选工作，深度挖掘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新时代好乡贤等道德典型的先进事迹，通过宣传栏展示、故事宣讲等形式扩大影响力，引导社区居民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培育社区文明新风尚。二是以文化活动培育居民惯习。一方面，深挖本土家风家训资源，聚焦传统优良家风家训的深层文化价值与当代传承路径，提炼出“明贤人伦、维学正身、敬畏文明、勤俭兴家、崇尚文明、德行天下”等核心家训内容，并精心制作榜单上墙公示，以传统智慧向居民传递社会规范，有效抵制铺张浪费、邻里纠纷等不良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为抓手，依托“党员大会、居民代表大会、文化广场”等阵地，通过“院坝会、节庆活动、民俗表演、送春联”等多样化实践活动，持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农村个人私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宣传教育，逐步教化并塑造居民的现代文明生活惯习。三是以活化文化记忆凝聚社会认同。L社区逐步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群众文化大舞台、村民文化广播系统、农家书屋、乡情陈列馆等文化基础设施，并系统搜集承载集体记忆的乡土物件布展于乡情陈列馆。同时，依托这些文化阵地常态化举办文化“三下乡”、传统节庆等主题活动，生动“活化”历史记忆，唤醒居民乡土情怀，有效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

与认同感。

##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文化堕距”理论，深入剖析L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实践过程发现：易地搬迁社区因受到由乡土到社区的环境骤变影响，适应文化变迁速率滞后于物质文化变迁速率，引发制度、组织与文化层面的堕距现象，对社区共同体构建形成阻碍。三维堕距的叠加作用导致易地搬迁社区在建设过程中产生“村落地域性消解”与“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实践张力，制约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针对这一结构性张力，需从制度、组织与文化三个层面开展堕距弥合与调适：通过塑造治理规则推动共同体秩序共建，通过优化治理结构驱动共同体资源共治，通过文化沉浸凝聚共同体价值共识，将已消解的乡土共同体在新社区进行构建，最终推动易地搬迁社区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识”的新共同体模式，进而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上述制度、组织、文化独特的弥合路径，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易地搬迁社区的治理堕距困境，但这种以外源性力量为主导的调适模式，可能导致已初步构建的社区共同体，因外部支持力量减弱或退出而面临瓦解风险。因此，如何重塑居民主体性角色、推动居民组织化发展，成为破解共同体可持续性难题的关键。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第一，重建乡村文化生态，增强居民主体性认同。搬迁人口离开熟悉的乡土村落社会空间，原有乡村文化体系遭到冲击，如传统道德式微、血地缘关系弱化、人情淡薄等，导致移民在易地搬迁社区中，无法从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情感归属和熟悉感，进而产生自我身份认同疏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主体性意识薄弱，易陷入集体行动困境。对此，需以传统文化为底色，打造适应且融入新时代文明的生态，通过激活各种文化要素的情感联结功能，唤起居民对乡土的情感记忆，促进社区内部有机团结，构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情感共同体，最终提升居民主体性意识，重塑社区认同。

第二，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推动居民组织化进程。从易地搬迁社区的居民特征来看，多数居民存在主体性意识薄弱、组织化水平偏低的问题，缺乏有效承接政府资源下沉并进行合理配置的能力，

这一短板容易导致易地搬迁社区自治乏力甚至失灵。因此,在遵循制度规则的前提下,基层党组织应主动引导基层干部、社会组织成员、搬迁移民等多元主体,通过民主协商共同制定社区发展目标,厘清各主体的权责利边界,促进主体间的信息互通与协同合作,提升社区多主体的凝聚力与组织化程度,从而实现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

第三,立足搬迁群众真实需求,提升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在易地搬迁社区的资源下沉实践中,可能存在基层政府出于自身行政目标诉求,通过政策“变通执行”遮蔽搬迁群体真实需求的情况,产生政策资源与政策对象不适配的“政策反噬”<sup>[30]</sup>后果,挤压易地搬迁社区的自主发展空间。因此,政府在进行政策设计之初,应立足搬迁群众的真实需求,广泛动员搬迁群体参与到政策制定全过程,并将群众参与机制制度化,确保搬迁居民实现全过程民主监督与民主参与,从源头降低政策执行偏差。

#### 参考文献:

- [1] 符平,卢飞.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脱贫攻坚的组织动员[J].社会学研究,2021,36(3):1-22,225.
- [2] 李杜若,何志武.联结、激活与整合:传播网络促进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重建的作用机制[J].中国农村观察,2025(3):148-172.
- [3] 谢治菊.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困境与对策建议[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15):112-127.
- [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论述摘编》[N].人民日报,2024-01-12(06).
- [5] 贺芒,赖翰文.多元共治、制度驱动与价值融合: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有效的实现路径——基于复合治理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重庆社会科学,2025(3):119-135.
- [6] 王寓凡,江立华.总体性动员与激励性实践:易地搬迁人口文化堕距治理的双重逻辑[J].社会科学研究,2022(5):123-129.
- [7] 吴振磊,李钺霆.易地扶贫搬迁:历史演进、现实逻辑与风险防范[J].学习与探索,2020(2):131-137.
- [8] 陈靖,刘明.上楼之后:“涉农社区”的生活秩序及其治理探索[J].中国行政管理,2020(11):59-66.
- [9] 高新宇,许佳君.空间重构与移民社区融入——基于“无土安置”工程的社会学思考[J].社会发展研究,2017,4(1):73-93,243.
- [10] 苏建健,李晓昀.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的空间情境-重塑过程——基于桂西南L县Z社区的调研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4(1):129-138,186.
- [11] 韦泽,周真刚.共生理论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互嵌式社区治理研究——以贵州省阿妹戚托社区为个案[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5(5):122-132,186-187.
- [12] 李杜若,何志武.联结、激活与整合:传播网络促进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重建的作用机制[J].中国农村观察,2025(3):148-172.
- [13] 刘洋.易地搬迁社区治理困境的生成机理及其纾解——基于结构紧张理论视角[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2):20-30.
- [14] 赵双,李万莉.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的困境与对策:一个文献综述[J].社会保障研究,2018(2):106-112.
- [15] 卢爱国.制度重塑生活:民族地区扶贫移民融入城市社区的制度分析[J].湖湘论坛,2022,35(1):32-41.
- [16] 袁明宝.行政统合与治理激活: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秩序建构[J].求实,2025(3):70-82,111-112.
- [17] 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王晓毅,陈育国,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 [18] 李利文.执法堕距:政策执行在基层缘何容易走样?——基于D村违法建设综合整治案例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21(8):122-129.
- [19] 王琪,陈昭.央地关系:制度堕距与改革的内卷化困境[J].山东社会科学,2017(5):132-139.
- [20] 杨发祥,沈锦浩.超越技术堕距:数字乡村建设何以可能? [J].中州学刊,2022(12):106-112.
- [21] 朱静辉,熊万胜.治理滞距:新公共卫生事件对现代治理体系的挑战[J].探索与争鸣,2020(4):224-231,291.
- [22] 石伟.制度悬浮与行为失调:农民集中居住区的治理堕距[J].中国行政管理,2023(3):134-141.
- [23] 徐建宇.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组织化的连接、选择与策略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9(9):67-72.
- [24] 李雪萍,陈艾.社区组织化:增强社区参与达致社区发展[J].贵州社会科学,2013(6):150-155.
- [25] GEERTZ C. Ritual and social change: A Javanese example[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7, 59(1): 32-54.
- [26] 朱婉菁,高小平.公众参与逻辑下的应急管理制度变迁——兼论制度变迁理论在中国的适切性[J].浙江学刊,2019(5):133-143.
- [27] 郭占锋,黄民杰.文化失调、组织再造与乡村建设——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论起[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8(1):83-96.
- [28] 河连燮.制度分析:理论与争议 [M].李秀峰,柴宝勇,译.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80.
- [29]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0-21.
- [30] 黄六招,林婷婷,尚虎平.政策反噬与认同危机:对易地搬迁社区内生性治理失效的一种解释[J].公共行政评论,2024,17(4):112-132,198-199.

责任编辑:黄燕妮